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权威全译本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权威全译本/(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339 - 6

I . ①菊… II . ①鲁… ②吕… ③熊… ④王…
III .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8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熊达云 王智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339 - 6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2

定价：50.00 元

增订版前言

《菊与刀》中译本 1991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重印 14 次,印数超过 10 万册。最近几年,由于中日关系备受关注,这本书的印数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几种与此译本大同小异的译本,价格高于此译本,印数却不低。这说明: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这本书资料丰富、文字生动、多有启发性见解,成了受欢迎的一本了解日本的书。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的注意。2005 年 12 月间,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特意为此前来商务印书馆和天津,采访此译本的责任编辑之一陈应年和译者之一吕万和,随即写了报道,刊于 12 月 30 日该报国际版。2006 年 2 月,《南都周刊》记者又为此书专门采访了三位学者(吕万和、孙歌、李长声),3 月下旬在该刊读书版发了长篇访谈录,标题是:《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性著作还在畅销》。

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列入“日本丛书”之时,曾提出是否修订。由于当时几位译者都很忙,未能修订。现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再次提出“修订和增补”,我们当然十分乐意。译者中有一位比较清闲,在另外两位在日本工作的译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全书通读修订了一遍并加以增补。

译者序言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战时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①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②。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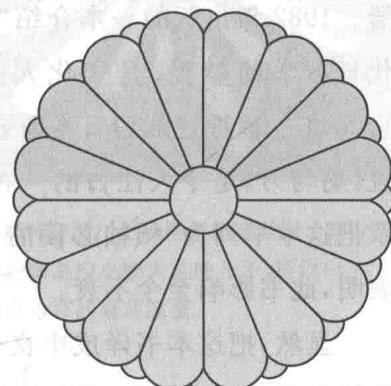
① 指“日本人隔离收容所”(The Japanese Relocation Camp, 1942—1946年)：珍珠港事变(1941年12月8日)后，在美日本人均被强制迁入隔离收容所，共约11万多人，其中约半数是美国公民。由于被收容者的揭发斗争和战后日美关系的改变，美国政府于1948年对少数被收容者给予赔偿，1988年全部赔偿、书面道歉，并曾公开展出此项错误。

② 金克木：《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读书》1981年第6期)，后收于作者的《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

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①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还出版了特集。^②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



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徽章

① 金克木：《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读书》1981年第6期），后收于作者的《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

② 《知性》杂志，昭和二十四年四月号；《民族学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号；《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号等。

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67年改版后至1980年又重印达53次。另有统计说，截至1996年，此书日译本重印逾百次，印数逾230万册（参阅本书303页注②）。按人口平均，每四十多个日本人即可拥有一册。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①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②近年，美国的《领袖周刊》有文章把这本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显然，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是值得的。经了解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无此书中译本，^③乃决定动手翻译。所据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46)，并参照了长谷川松治译日译本《菊と刀》（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第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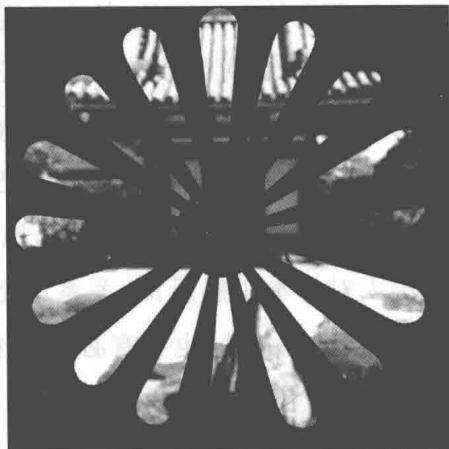
① 《世界的日本人观·日本学总解说》，自由国民社，1982年，第260页。

② 《日本人的自画像》1986年2月2日号，副田义也的文章。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③ 此稿译成后始见台湾黄道琳先生译本，书名译作《菊花与剑》，著者姓名译作潘乃德，桂冠图书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时曾稍加参阅。

种，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译或照录，日译本注及中译者的补注则分别加“日译者”或“译者”字样。原著有鸣谢及索引，中译本从略。

现在，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颇令人眼花缭乱之感。我国一位学者举出六种主要学说并加以评论，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被列为第一种。^①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自应留给读者研究。这里我们想提出的是：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



一休禅师墓园门上的镂空菊花雕刻。因为一休禅师是后小松天皇的儿子，所以门上有日本皇家的菊花家徽。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增杰同志所著《国外日本文化研究概况》一文，六种主要学说是：a.“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b.“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c.“集团性”说（[澳]G.克拉克）；d.“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e.“壶状文化”说（丸山真男）；f.“感情文化”说（堀一郎）。

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① 这段话很有启发。实际情况表明，同是封建主义，不仅东西有别，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资本主义，也各有其特色。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如果这样理解不错，那么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自应从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连接上下功夫，其结果也必将大大丰富和加深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推进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战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更有条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这正是我们翻译此书的动机。至于翻译质量，限于水平和精力，难免舛误，敬希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8日写定，

2007年11月15日稍做修改

补记：

参加校译此书之时，正是我的伴侣和合作者崔树菊同志（天津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讲师）以残肢之身卧床百余日，与癌症恶魔最后搏斗之时。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为慰，忍耐病痛，不断询问进度。交谈此书，几乎成为我们相濡以沫、互润愁肠的一种慰藉。定稿之后，她日渐腹胀如鼓，饮食药物均难服

^① 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读后感》，《比较文化论集》，第185、187页。

用。幸赖老友刘肃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英文教师)组织同道,誉清译稿,认真核阅,订补疏误。现在,我最后复阅清稿,树菊已闭目辞世五十日矣!谨补数语,以托哀思。

吕万和

1986年9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18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69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90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105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122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32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159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76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06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230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67
附录一: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	285
附录二: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293
索引	304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正如前此 1905 年的沙俄一样^①，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人的性格”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

^① 指日俄战争。历时 19 个月（1904 年 2 月—1905 年 9 月），日军投入兵力近 110 万，俄军投入兵力近 120 万，双方伤亡惨重，在美国调停下议和；俄国被迫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益，把俄国在辽东半岛、南满铁路的特殊权益转让日本，并将我国库页岛南部让给日本。——译者

² 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³ 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了解日本既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其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

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顽抗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我于 1944 年 6 月接受委托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受命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夏初，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在美国，许多人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也许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在日本，有的人则认为这次战争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国民仍然以为他们是胜利者。⁴

然而，进入 6 月以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全部兑现，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告日军终将彻底失败的大战役。在这以后，我们



1942 年 11 月，瓜达卡纳尔岛，两名
美军士兵在轻型坦克前警戒

的士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而且，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①、缅甸^②、阿图^③、塔拉瓦(Tarawa)^④、比亚克(Biak)^⑤等战役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到了 1944 年 6 月，我们对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做出解答。这些疑问，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⁵、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要轻易地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

① 指瓜岛争夺战(1942年8月7日—1943年2月7日)：瓜岛(瓜达卡纳尔)在所罗门群岛最南端，是日军南线最前沿阵地。1942年8月7日，美军出其不意，出动大批海空部队攻占该岛(其时日本守军仅200余人)。日军增兵夺回。双方惨烈争夺，历时6个月，几乎无日不战。美军投入兵力七八万，死亡约2000。日军先后派兵3.6万，战死病死高达2.5万，最终败退。太平洋战局由此转折。——译者

② 指缅甸战役。1944年冬，英印联军大举奔袭仰光。中国远征军自北缅南下。日军十余万人除战死者外，有七八万人饥饿呻吟而死。——译者

③ 阿图岛：1942年6月初，日军为发动中途岛战役，故意派大舰队佯攻美国领土阿留申群岛，占领毫无设防的阿图岛、基什加岛等地，企图迷惑美国。美军由于破译了日军情报，不为所动。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毁灭性失败。阿图岛、基什加岛残留日军于1943年5月、8月被俘逐。——译者

④ 塔拉瓦：指吉尔伯特群岛的主要阵地塔拉瓦环礁，位于所罗门群岛东南。1943年6月，美军3万多人在此艰苦战斗，伤亡3000多人。——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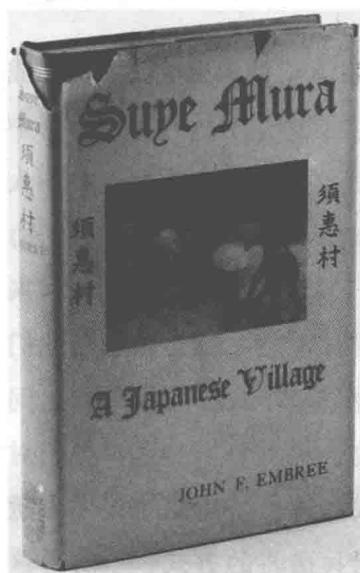
⑤ 比亚克：指新几内亚战役中的最后一战。1944年7月，美军苦战两个多月攻占该地。——译者

会怎样做，日本人也会怎样做。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与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并且暂且不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显露自己。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严重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做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①写⁶

① 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 1908—1953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历任夏威夷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期间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培训驻日美军民政人员。1935—1936年以须惠村为典型，研究日本社会，写成专著：《须惠村——一个日本的农村》(*Suye Mura: A Japanese Villag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39)。全书330多页，内容包括：历史背景、村内组织、家族状况、互助形式、阶级与联系、个人生活史、宗教、社会组织上可觉察的变化等。——译者



约翰·恩布里著《须惠村》

我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发现他们如何进行判断的方法,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空白;我认为,这对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大都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追踪其发展。我则确信,许多问题的答案大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答案会更加满意。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看书,或没有受到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的教益。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极大,这是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无文字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记录。西方人的论述也是凤毛麟角,浮

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实地观察后写出的唯一的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专著,很有价值,但我们在 1944 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那本书却还没有提到。

尽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还可以运用一些研究方法和公认的假设或前提。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我国有许多在日本长

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